

17.9

五、二、五、五、五、五



第一卷

(大)

5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纪念伟大、光荣、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周年！

目 录

武汉建党初期的回忆.....	李伯刚 (1)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武汉早期的传播.....	曹宪林 (7)
董老早期在武汉的革命活动片断.....	余义明 (12)
在武汉军校的日子里.....	程子华 (24)
忆武昌中央农讲所的学习.....	涂国林 (27)
崇实中学和吴德峰同志.....	费佩如 (32)
我的父亲李汉俊.....	李声簧 (35)
大革命时代的武汉所见所闻.....	杨玉培 (42)
陈潭秋烈士在武汉.....	吴白狐 (57)
陈潭秋、毛泽民烈士 被蒋介石、盛世才勾结谋杀的内幕.....	郑大纯 (67)
碧血千秋照湘江 ——记何功伟烈士在鄂西.....	闻一尧 (77)
我是怎样亲手埋葬何功伟烈士的.....	刘裕松 (111)

新四军五师千员伤病员北上记·····	袁 文 (119)
难忘的一次“飞行集会”·····	李守宪 (126)
“六一惨案”纪实·····	吴煜令 (129)
疑云迷雾中的汉口《星报》《晨报》·····	关锡庚 (148)
在武汉警察界里的战斗·····	陈叔一 (157)

武汉人民反帝斗争的第一回胜利

——回忆收回汉口英租界·····	周何亮 (161)
汉口英租界的英帝罪行·····	李绍依 (164)

汉口水电事业的由来和演变

——记汉口既济水电公司·····	贺衍夫 梁绍栋 (181)
武汉第一家华商打包公司的回顾·····	刘笃生 (191)

小资料

中共五大·····	(6)
八七会议·····	(110)
《向导》报·····	(76)
宁汉合流·····	(160)

武汉建党初期的回忆

李伯刚 遗稿

(一)

一九二〇年九月中旬，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开成立会，参加会的只有六人：刘伯垂、董必武、张国恩、包惠僧、陈潭秋和郑凯卿。最初，刘伯垂在上海由陈独秀吸收入党，派回武汉，同时交给他一个党员名单——郑凯卿。再由刘个别谈话吸收董、张、包、陈四个人组成。会后找到多公祠五号作机关，后来又搬到黄土坡。一九二一年秋，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后不久，武汉党区委员会也成立了。除原共产主义小组的人外，加了黄负生等人，由陈潭秋任书记。接着组织利群书社的恽代英、林育南、李求实、刘光国和我入党。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间，一度改推刘昌众任书记，陈潭秋搞组织，我搞宣传。当时区委的工作是联系工人开展工运，推动学运，动员妇运。发展党员，以知识分子较多，工农分子较少，如最初小组成员郑凯卿，文华大学校工，是陈独秀在文华公书林（即文华大学图书馆）讲学时发展的，大革命后，下落不明。还有一个赵某（名字记不起了），武昌平湖门外纱局失业工人，是郑凯卿介绍的，因赵一直不能开展工作，而生活要组织维持，二二年由包惠僧介绍到广州参军，以后下落不明。我到徐家棚去办粤汉铁路工人补习学校，通过我的学生孙瑞贤的关系（他的父亲孙镜芳是粤

汉铁路徐家棚工厂监工），取得工作上的便利，因而他被吸收入党。徐家棚工会负责人孙登芳，工作比较积极，“二七”大罢工时，他的爱人被军阀军队殴打，因伤致死，他到广东海陆丰参加农民运动，一直未被吸收入党。“二七”老工人，多年没有一个被吸收入党。刚解放时，有一个来访问的法国人道报记者到江岸同二七老工人座谈，知道没有一个共产党员，非常诧异。认为我们的建党工作，不能说没有问题。

区委成立后不久，李汉俊也从上海到武汉，逐步成立了武昌、汉口、汉阳、江岸、徐家棚几个小组。二七前夕，全区党员约三十余人。各县还没有发展党员。

区委一直没有自己的机关刊物，全靠运用社会关系、社会力量开展工作。如《武汉星期评论》，是我们同一部分知识界的朋友捐款凑合创办的，文章也是大家投稿，是一个党领导的文化统一战线刊物。一直是我们的同志主编，先是黄真生，黄病死后是刘子通，刘被迫离汉后由我负责。文章也以我们同志写的较多，一直以知识分子为对象。后期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的文化批判文章较多，结合工运问题的很少。有关工运文章都没登别的报刊。如武汉的《真报》、《时事白话报》、《江声报》以及北京的《工人周刊》等报刊。还有一个《湖广新报》，是一个日本人办的报纸，主编张子余参加过辛亥革命，同施洋认识，林育南和我都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和他有联系，他常把比较重要的工运、学运的消息破例登在第一版，并发表支援评论。“二七”前夕被吸收入党。我和刘昌群、张绍康又组织了一个全民通讯社，除自己发稿外，以同行关系联系一些新闻记者，供给有关消息，统一口径，有利宣传。

(二)

党领导武汉工运问题都是在区委会议讨论决定，会议有的在

武昌涵三宫武汉中学教务室开，有时在武昌三道街西马圈刘昌众家中开，没有在黄土坡机关开过。一九二二年以后，汉口地区的一般具体问题，就由汉口小组自己开会解决。汉口小组那时是由林育南负责，以后改为支部。武汉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区委成立，原由包惠僧负责。一九二二年包调上海，改由林育南负责。同年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林育南任总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即秘书长）。党、书记部、工团联合会的领导是统一的，所以二七罢工，林育南是一个重要的领导骨干，他做了许多宣传组织工作。《罢工宣言》是他起草的，《二七工仇》是他主持汇编的，《施洋传略》也是他写的。

“二七”罢工，武汉区委动员了一大部分力量参加。除全部参加工运工作同志外，还派了刘昌绪（大革命之后脱党，不知下落）到江岸协助项德隆（后改名项英，武昌日知新小学毕业，武昌模范工厂织布工人，“二七”后，米夫建是他到中央）工作，派李之龙帮助我在工团联合会负责各方面工作。武汉各学校的青年同志都参加散发江岸京汉工会出版的罢工宣言等油印刊物，搞宣传工作。我们也组织了一些社会舆论，但因没有组织起广大同盟军——农民的支持，也没结成其他阶层的统一战线，致成孤军作战之势。

一九二三年一月底，京汉总工会在郑州开成立会时，武汉同志前往参加的很多，工会调专车运送，陈潭秋、林育南、施洋、李汉俊等都去了的。各工团代表，还有学生代表李之龙等也去了的。

(三)

旧中国产业工人没有健全的工会组织，一九二一年党一成立，就设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设立支部。……毛泽东同志在“大学工作时，就到长辛店进

行过教育铁路工人的工作。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支部成立后，在长辛店设立了铁路工人补习学校，由吴汝铭（北京支部成员、《工人周刊》编辑，大革命后自首，曾任张学良读书秘书，抗战初去江西，以后不明下落）负责。在郑州也设立了补习学校，北京派李震瀛（二七后脱党，不知所终）、武汉派赵子健（人骥，曾参加武汉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二七”前回武汉，在武昌高师毕业，当中学教员，大革命后脱党，解放前自杀）参加工作。江岸只和长辛店、郑州的工人有些联系，悬了一段时间没有派人设校，后来在长辛店成立工人俱乐部时，武汉派了项德隆到江岸，直接参加筹备工人俱乐部。

江岸铁路工人原分湖北、福建、安徽三帮，各有组织。湖北工人用“老君会”名称。帮与帮之间存在矛盾，在取消帮派组织及选定俱乐部委员问题上，经同长辛店、郑州工人代表，还有粤汉铁路徐家棚工人俱乐部工人代表参加协商解决，协商结果：主任湖北帮杨德甫，副主任福建帮林祥谦、安徽帮姜绍基。大罢工前俱乐部改为工会，主席是林祥谦。在工会领导下，逐渐克服帮派残余思想，紧密团结，一致对外。到“二七”罢工，军阀吴佩孚进行镇压时，面对敌人的刀枪，前仆后继，纠察队长曾玉良保卫工会，一个军阀士兵向他开枪，曾玉良抱起身边另一个士兵对着枪口，同归于尽。显示了工人阶级不畏强暴，不怕流血牺牲的英雄气概！

与江岸一江之隔的徐家棚铁路工人也有湖北、天津、广东三帮。那时粤汉铁路局局长是天津人，重要职员也多是北方人，引用了很多北方工人，他们敌视工人俱乐部，另外成立一个研究所，想拉北方工人参加。我们听说有一个铁路工人同曹锟是老乡，青年时期是朋友，一道背布捆做过小商贩，后来曹锟当了两湖巡阅使，他在粤汉铁路当工人，去找曹锟，想会会老朋友，曹锟不见，卫兵把他轰了出来，在工人中传为笑话。我们就用这个故事

教育工人，说明工人只有同工人做朋友，工人要团结起来。因而徐家棚的北方工人未被研究所拉过去，参加到工人俱乐部里来了。徐家棚铁路工人的团结，在江岸工人罢工期中也起了支援作用。

(四)

京汉铁路成立总工会，党中央派张国焘参加。大罢工时，他住汉口三元里，原来是林育南和他联系，后因林的工作太忙，改由我联系。我陪他住了几天，还联络工团联合会及江岸的情况，他不大出去，也未发表什么指导意见。“二七”的第二天他主张全面复工，自己立即跑到上海去了。接着党中央也来电要各工会全面复工。

郑州开会时，我留守武汉没有去。听李汉俊回来说，商讨论罢工要求条件时，张国焘提出十几条，有“平其功于一役”的想法。少数同志（李汉俊在内）主张不多提，只提要求吴佩孚派人送还总工会东西一条。因为罢工是要吴佩孚承认总工会。《罢工宣言》也是突出在争人权、争自由。答应这一条就是表示承认总工会，也包含了道歉。其他条件留待以后再说。当时的情况，对我们来说，只利于速战速决，不宜拖延时间。因为：（一）时间正值农历年关，客货运输非常紧张，交通中断，对城乡群众生活，影响很大，而我们的宣传组织工作跟不上，未能广泛发动舆论，结成统一战线，争取社会同情，得到有力支援。（二）有些条件，吴佩孚也要商得北京交通部、内务部的同意，不能立即作答。（三）工会刚成立，没有罢工基金，不易持久。总之，拖延时日对我们不利。张国焘只看到工人代表情绪激昂的一面，没有对客观具体情况全面分析，所提条件远离现实，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导致罢工失败。

“二七”之后，武汉工人转入地下，党在汉口华清街及胜利

街、六合路等处设置联络站，办过京汉铁路死伤、失业工人的善后救济工作，联络工人积极分子，蓄积力量。项英、许白昊、刘子通（党员，武昌一女师教员，“二七”后病死），周天元（江岸工人，“二七”前入党，“二七”后失业，以后脱党，在江岸黄色工会负责，九一八事变时，因宣传抗日被国民党枪毙）等先后住过机关。我从安源回来也参加过。从此，星星火种，深藏待发，不到两年，终于石破天惊，大革命接着到来了。

（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供稿）

小资料

中共五大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在武昌都府堤武昌高等师范附小举行。出席代表八十人，代表党员五万七千九百余人。董必武、陈潭秋代表湖北党组织出席了大会，大会是在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中国革命处于紧急关头召开的。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通过了实行土地改革的决议和斥责机会主义的决议。但没有能够对陈独秀所推行的机会主义路线给予真正有效的抵制。毛泽东同志被排斥于大会的领导之外，向大会提出的迅速开展农民革命运动、大力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政权等提案，根本没有提交大会讨论就被扼杀了。瞿秋白、任弼时等同志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领导，却未取得决定性的反响，仍选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使得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继续在党内推行，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的危害。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武汉早期的传播

——李伯刚同志的谈话摘记

曾宪林

在“二七”大罢工四十周年前夕，我曾几次访问了参加过“二七”斗争的李伯刚同志。现将其所谈的几个主要问题摘记如下：

他首先说：“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对武汉革命运动 and 工人斗争是有影响和推动作用的。”然后他谈到毛泽东同志初期革命活动时期两次到武汉的情况：“一次是一九二〇年春，当时湖南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驱逐张敬尧运动，为了组织力量，毛泽东同志派出‘驱张’代表团到全国各地进行宣传。这时毛泽东同志和他的学生张文亮在到北京去进行工作的途中，于武汉停留了将近一个星期（住当时武昌的利群书社）。在此期间，他还起草了一个反张敬尧的电文，交给我带到汉口去投寄。那时，毛泽东同志还和恽代英同志交谈过共同工作的一个问题。另一次是一九二二年元月，湖南黄陂惨案发生以后，毛泽东同志领导湖南人民进行斗争，为此，他亲自到上海去过一个时期。当路过武汉时，在这里停留了十多天，住在黄土坡十六号（应为二十七号——笔者注），当时这里是中国共产党武汉区委员会工作部。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也设在这里。此后，一九二二年九月，毛泽东同志领导粤汉铁路工人组织工会的时候，他派郭亮同志在长沙工作。当时我在徐家棚搞工会工作，一九二

一九二四年

二年夏曾到长沙去过，商量粤汉铁路成立总工会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同志派李立三同志和我到岳州站，推动成立工会的工作。”

李伯刚同志还谈到利群书社和他们的活动情况。他说：“利群书社成立前，恽代英同志在武昌中华大学组织有一个互助社，开始是一个学习性的组织，其目的是为了学习和修养上的互相帮助。后来这个组织还逐渐扩大，并提出了改造环境、改造自身的口号。‘五四’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比较广泛地传播了。这时武汉也出现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体，其中主要的是利群书社。它是在互助社的基础上，加上一部分‘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和要求进步的青年组织起来的，林育南、李伟森、肖楚女、谢远定等烈士都是这个书社的成员。施洋同志也和书社有密切联系。书社出售《新青年》、《星期评论》、《湘江评论》等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刊物。后来我还经手编写分发过党前驱的刊物《共产党》及其他一些小册子。”

他说：“我们这一批人，受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在利群书社成立初期，还是革命民主主义者。记得当时我们写有‘共同生活的宣言’和‘未来之梦’，内容是反对当时黑暗社会和对未来生活的设想。虽然文章有社会主义的色彩，但对共同生活方面还有不少空想成分。文章发表后，当时曾有人在《新青年》上，就这一点批评过我们。这时，恽代英同志为《新青年丛书》翻译了一本《阶级斗争》。此书的翻译对恽代英同志的政治思想的提高，起了重大作用。这也促进了我们的提高，我们从此书的内容开始明确：要改造中国必须进行阶级斗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

“利群书社的成员，每天有日会（晚上开），会议大多由恽代英同志主持。内容比较广泛，有学习心得交流、道德品行的检查等，同时社员每天写日记，并互相传阅。

“利群书社为扩大影响和直接与工人接触，办了一个利群毛

市厂，厂的负责人是张浩同志。

“利群书社同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组织的文化书社有联系。除业务上往来以外，利群书社还派吴华梓同志等几人到湖南师范学校（应为湖南一师——笔者注）去学习，此后，武昌利群书社停办后，张浩同志带领一些工人到湖南参加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毛巾厂去工作，从此，张浩同志就很长一段时间，在湖南跟随毛泽东同志工作。

“利群书社在一九二〇年后，由于客观形势的影响开始逐步收缩，转入农村或城镇，通过办学，以学校为据点进行工作。如当时林育南等同志在黄冈团风附近回龙山办培新小学，黄负生、李伟森和我在汉口致忠学校教书，我们一方面利用这些学校来扩大宣传、培养干部，另一方面经常利用星期天和假期，通过访贫苦学生家长同工人、农民接触。

“一九二一年夏天成立了共存社。成立大会是在黄冈培新小学举行的，当时文化书社派易礼容参加大会，会上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等重大的理论问题，并通过了代英同志起草的章程。当时共存社联络外设在汉口致忠学校。联络的范围有武汉、黄冈、黄陂等地，甚至北京、上海、湖南、四川以及国外。党成立后，恽代英同志和我们陆续加入了党。”

关于湖北党组织建立的经过情况，李伯刚同志说：“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实际领导工作是由董必武、陈潭秋同志负责的。一九二〇年秋，小组成立大会是在抚院街（三十号或三十二号）举行的，陈潭秋同志是组织委员。小组成立后租山前多公祠五号为机关。那时第三国际的代表派有代表（即当时北京大学教授杨超伟）来汉，在德明饭店（现江汉饭店）和董老等见过面，并交谈过问题。党正式成立后，就在武汉成立了武汉区委员会。”

李伯刚同志还谈到了一些武汉工人运动有关的情况。

“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就开始领导工人运动。党的第一次

代表大会后，董老回到湖北就集中领导了工人运动，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记得当时党指示我到徐家棚搞工人运动，于是我就在一九二一年秋离开致忠学校，按照党的指示在徐家棚办粤汉铁路工人补习学校。学校办起来后，接着工运就搞起来了，成立了工会（当时称俱乐部）。不久京汉铁路的江岸也搞起来了。一九二一年冬（十二月），武汉区委领导了汉口租界人力车夫罢工，反对外国车行加租，此次罢工中施洋同志参加了领导工作。当时罢工开始后，面临的问题一是要坚持下去，二是要接济罢工的经费。党领导斗争中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一方面通过工人中的骨干樊一狗进行工作，坚定工人斗争的信心，加强团结。此外，施洋同志和我们联络记者和报社，写稿支持工人罢工，争取舆论；另一方面团结社会人士，争取他们支持工人斗争。记得‘五四’时期，武汉开展提倡国货时还有八百元宣传费没有用完，由几个爱国商人负责管理。人力车夫罢工时，施洋同志找他们商量，他们答应将此款拿出来援助罢工。这次罢工取得了完全胜利，并建立了人力车工会，会所在大智路。这一胜利有很大意义，因为当时一般认为人力车工人比较散漫，难以组织，但事实证明，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不但能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这不仅对铁路、工厂、企业等的工人有很大的鼓舞作用，同时更重要的是使大家看到必须组织起来进行斗争。

“一九二二年十月，武汉成立了湖北工团联合会，会址设在人力车工会会所，那时总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即秘书长）是林育南同志，组织主任委员是项英、许白昊同志，教育主任委员（即宣传委员）是我，施洋同志是法律顾问。”

最后李伯刚同志谈到“二七”大罢工时有关施洋同志被捕的情况。他说：“关于施洋同志被捕的时间，不少资料记载中说是二月七日晚上，施洋同志的夫人郭继烈同志回忆中也说七日晚，这是记错了的。这件事情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的情况是这样：

‘二七’屠杀在江岸开始时，我和李之龙在工团联合会负责联络工作，当时工人来报告江岸屠杀时，李之龙很机警，他说，现在不能在屋里呆着，我们应该在屋外等待工人来联络，当时我们走出大门不久，果然军阀就来封闭工团联合会。那时天将黑了，我和李之龙就到三元里和日租界几处党的联络地方去找林育南和施洋同志，但没有找到，直至第二天清早才在施洋家中找到施洋同志。当时他家电灯还未关，他还在看报，我和他谈了外面的情况后，他定要我们到附近去吃早点后再说。当我们刚吃了点东西，在返回施洋同志家中的路上，碰到樊一狗同志，他告诉我们不要去，施洋同志已经被捕了。那天李维汉同志路过武汉，也去会施洋同志，看见他家门口有人看守，情形不对头，就过门未入。施洋同志被捕后，我们有十几人被吴佩孚通缉，我也就离开武汉了。”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整理）



董老早期在武汉的革命活动片断

余义明 遗稿

一九一六年六月，我在私塾读书，我的父亲文海请来两位客人到学校来玩，一位是我的舅父张眉宣，另一位就是父亲的老友董必武先生（下称董老）。他们是不久才从黄安县（现红安县，下同——编者）监狱出来的。为了欢庆恢复自由，祖母特别做了一些可口的菜肴招待他们。

亮节高风 威武不屈

董老在辛亥革命后，就同张眉宣、张谐英两先生在日本东京留学，参加了孙中山先生所组织的中华革命党，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一九一四年归国，正值袁世凯为恢复帝制积极准备，视革命党人为眼中钉、肉中刺，进行血腥镇压，董老同张眉宣先生就成为湖北最危险的人物了。黄安县知事王立廷奉到密令逮捕他们，这是第一次，张眉宣先生脱险，董老入狱。

据我的二哥庶苏告诉我，一九一五年春天，董老在黄安高等小学堂给他们上历史课，讲到民族英雄文天祥慷慨就义视死如归的崇高气节，刚讲完文天祥衣带上的赞文“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学生都被这个慷慨激昂的讲述吸引住了，忽然校工来对他说：“校长请你马上去。”董老来到校长吴海南的办公室，一群疯狗似的法警没有说明原由就拉他走。当时激怒了全校两百多学生，包围法警，要夺回他

们最敬爱的老师。经校长、老师们多方劝阻，才让离校。临行，董老从容举手向同学们告别。

董老被捕后，经过县知事王立廷再三询问，没能从他的口中得到半点关于革命的真实情况。在狱半年，学生们成群结队不断前往探望，全县各界舆论沸腾！王立廷迫于社会上的谴责和压力，不得不将董老交保释放，但暗中却派便衣监视，不准离开县城。

就是这年冬天，王立廷又奉到密令，第二次将董老逮捕，同时逮捕了张眉宣先生，硬逼着他们供认是孙中山先生的党徒，图谋不轨。因而激起了全县人民的公愤，以陈逵九先生为首的代表团组织起来了，理直气壮地找王立廷理论，掀起了一个营救董、张出狱的请愿运动。高等小学堂的学生们，为了营救老师，更是闹翻天，多次集体到县署请愿，震动很大！王立廷明知董、张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但又拿不出“图谋不轨”的真凭实据，说服不了请愿代表团，也压不住学生的愤怒。拖了半年，王立廷怕闹出乱子，丢掉乌纱帽，不得已，只好把董老和张眉宣先生开释了。当开释时，王立廷忸怩作态地说：“为了保全你们的性命，我确实费了很多心血挽救你们。希望你们不要误会，我是没有恶意的。”董老听了轻蔑地一笑：“谢谢你的好意，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

培育青年 传播革命种子

一九二一年，我到武昌私立武汉中学上学。这个学校是一九二〇年秋季开始创办的，董老是主要创办人，是常务校董。创办人还有陈潭秋、张眉宣、李全山、刘冀民、倪季端诸先生。校址设在武昌涵三宫旧教育会内，一切因陋就简。初办两班，约一百学生，以后每季增设一班，约五十至六十人。学校经费，主要是董老和张眉宣先生到处募捐筹集的。经常入不敷出，捉襟见肘。